

我在乡村学校当老师

杜观水

人生中,有些经历看似短暂,却在记忆里留下深深的印记。于我而言,那段在青山环抱的乡村学校任教时光便是如此——它安静地卧于岁月一隅,至今仍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回忆。

1986年秋,我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,被分配到吴川一所完全中学。学校虽设初高中,条件却颇为简陋:仅有两排瓦房,一排八间用作教室,另一排八间为师生宿舍,另有两间分别用作会议室和食堂。学校坐落在半山腰,每逢下雨,山间雾气氤氲,读书声与雨声交织,别有一番滋味。

我负责全校体育课。学校共8个班,初中每个年级2个班,高中为两年制、各1个班,我每周要上16节课。后来我才知道,自己是这里第一位正规师范体育专业毕业的教师。此前体育课均由其他科目老师兼任,所谓上课,不过是给学生一个篮球或乒乓球让他们自由活动,多数学生要么在野外闲逛,要么回教室自习。

第一节课,我特意穿上新买的运动服,认真备好教案,上了一节室内体育理论课,讲解体育基础知识与课堂要求。站在讲台上,我看见孩子们一双双好奇的眼睛。下课后,坐在第一排、辫子扎着褪色红头绳的小姑娘李恒英追出来问:“老师,您会不会像之前那位体育老师那样,教不到半年就走啊?”我心里一紧。后来才知晓,因地处偏僻,学校一直缺体育老师,之前只能找略懂体育的人代课,待得最长的也不过半年。

实际困难比想象中更多。尽管我反复要求,没几个学生穿运动服、运动鞋上课;他们连最基本的立正、稍息都不会;体育器材也极简陋,没有像样的跳高跳远沙池,更无单双杠。更令人头疼的是,从校长到老师,大家都不太重视体育课。

幸好第二年,中考加试体育,成绩不及格将影响中等师范学校报考。校长这才重视起来,添置了必要器材,还挖了跳高跳远的沙池。记得第一次教广播体操,我一丝不

苟地示范每个动作,却发现学生连最简单的伸展运动都做不协调。放学后,体育委员梁春明红着脸对我说:“老师,我们从来没正儿八经上过体育课,连向左转、向右转都分不清。”这番话让我陷入沉思。

从第二天起,我从最基础的队列训练教起:用石灰在操场画线,教他们对齐;用竹竿做简易跳高架;拿废旧轮胎当障碍训练器材。学生们第一次体验到真正的体育课,虽个个满头大汗,却兴致勃勃。

那之后,我开始“因地制宜”调整体育课内容:没有垫子,就用稻草堆练前滚翻;没有标枪,就用竹竿代替;没有铅球,就去河滩捡合适的鹅卵石。我还自创“游戏教学法”,把枯燥的体能训练转化为乡土游戏,让孩子们在玩中学、玩中练。

最让我欣慰的是学生们的改变。起初跑几步就喘的孩子,经过半年训练,在校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李恒英原本体弱多病,坚持晨跑和锻炼后,脸色红润了许多,感冒也少了。她奶奶特意来学校感

谢我:“杜老师,恒英现在吃饭香、睡觉踏实,都是锻炼的功劳!”

那年冬天,学校破天荒举办了第一届田径运动会。村民们拖家带口来观看,为孩子们加油。看到学生们在简陋场地上奋力拼搏的模样,许多老教师感慨:“这么多年,还是头一回见学校这么有生气!”

第二年,县里举办中小学运动会,我们学校首次跻身团体前十名。校长格外高兴,特地批了更多经费添置体育器材,村民们也自发来帮忙平整操场、修建乒乓球台。

三年后,我带薪进修,之后留在县城工作。如今那所学校已建起标准运动场,也有了专职体育教师,但我仍常想起那里的哨声、红土操场上奔跑的身影,以及孩子们从怯懦到自信的转变。

那段岁月让我深切体会到,体育不只是动作的传授,更是身体与意志的磨砺。这些淳朴的孩子也让我明白:一堂扎实的体育课,能影响一代人的体质;一位认真的体育老师,真能改变许多孩子的一生。

二十五年前的牵牛花

裴金超

教师节就快到了,一到这个日子,街上的花店就又忙碌起来。各种花香混着初秋的凉风,直往鼻子里钻。我路过一家花店,忽然想起陈老师,脚步顿了顿,推开了店门。

我捧着一束由康乃馨与百合组成的花束,循着记忆中的路线,向陈老师家走去。陈老师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,如今算来,怕是早已过了古稀之年。记忆里的她,中等身材,戴一副红边眼镜;印象最深的是,她讲课的声音虽不大,却极具穿透力,一字一句都能直抵人心。

记忆中的巷子好像变窄了,青石板路被踩得溜光水滑,两边老墙上爬满绿油油的藤蔓。16号门牌还在,木门旧得发黑,门环却锃亮——看来常有人来访。我犹豫着抬起手,还没敲下去,就听见院里传来一阵咳嗽声。那声音太熟悉,一下子

把我拉回了二十多年前。

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开门的老人让我愣了片刻:白发如芦花,腰背佝偻,只有那双眼睛还像从前那样亮,像两口深井,盛着不曾枯竭的光。“你找谁?”她问。

我兴奋地说:“陈老师,我是99届的学生……”她眯眼打量我,忽然笑起来:“哦!想起来了,你是小裴!咱们可二十多年没见了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陈老师看出我的窘迫,连忙侧身招手:“进来坐,进来坐。”

小院不大,方方正正,却养满了花草。屋檐下整整齐齐擦着书,都用塑料布细心盖着;木桌上摊着一本《诗经》,书页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批注。她招呼我坐下,自己慢悠悠走到檐下,轻轻掀开塑料布,翻了半晌,抽出一本泛黄的作文本和一个牛皮纸信封。信封上写着:99届裴。“喏,你的。”她递给我。

我双手接过,翻开作文本:第一页是歪歪扭扭的标题《我的理想》,第二页是《春天的发现》,第三页是《雨巷》……翻到《母爱》那篇,我写母亲“头发里藏着几根银丝”,她在下面画了波浪线,旁批:“观察入微,然‘藏’字不妥,银丝何需藏?光明正大才是正道。”最后一行,她写道:“你有天赋,不要放弃写作。”泪水一下子模糊了视线——最后一行她当年写在作文本上的话,我竟从未看见:那时急着看分数,瞥一眼后,就没再往下翻。

陈老师改作文一向极仔细:每遇佳句,必用红笔圈出,旁批“妙极”;若有疏漏,便细细修正,末了总缀一两句鼓励的话。我的作文本上密密麻麻全是她的笔迹,有时红字比我的蓝字还多。

我又打开信封,里面是几朵干了的牵牛花,红的、蓝的、紫的。一瞬间,我想起了25年前的那个教师节。那年,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给老

师送礼物,可当时都是农村孩子,囊中羞涩,就算花钱买了东西,老师也肯定不收。我便像应付差事似的,上学路上随手在路边摘了几朵颜色不同的牵牛花……

陈老师看着我,笑眯眯地说:“这是你当年送我的教师节礼物。”我羞愧地低下头,紧紧攥着信封。原来真有人会如此珍视学生不经意的一点心意,像收集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,小心翼翼珍藏这么多年,一粒都不舍得丢。

那天下午,我们聊了很多。她说起以前教过的学生,有的成了作家,有的当了老师,也有的只是普通工人,但都活得堂堂正正。她还自豪地跟我说:“你们就像蒲公英,飞到哪里,就在哪里生根发芽。”

的确,真正的教师从来如此——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烛,不是要学生记住蜡烛本身的模样,而是要他们怀揣这团火,去照亮更远的地方。

